

非规约传信义在具有“亲涉范畴”语言中的凸显和错位*

张 玲

[提要] 本文基于“亲涉范畴”的人称敏感性和句子中主要谓词的[±自主]特征,将“亲涉范畴”所分布的语境分为四类,认为“亲涉范畴”在不同语境中会凸显不同的非规约传信义。虽然这些非规约义在传信系统中并不罕见,但一种语言是否具有“亲涉范畴”会影响其表达非规约义的信源类型,并产生“逐级错位”的现象。

[关键词] 亲涉范畴 传信功能 藏语拉萨话

一 引言

“亲涉性(egophoricity)”^①现象的研究始于以藏缅语为主的喜马拉雅地区的语言,是指在描述事件或情景时,言谈主体对个人的知识或亲身经历的强调,使言谈主体与认知权威(epistemic authority)具有一致性。“亲涉范畴”即采用语法手段对亲涉性进行编码(吴越2020)。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亲涉性”的理解逐渐深入,研究范围也日趋扩大,很多语言(包括汉语)都被发现存在亲涉性现象。

本文旨在考察“亲涉范畴”在不同语境中所凸显的非规约传信义。我们首先解释“亲涉性”;其次从“信息来源”和“获取途径”两个维度出发,说明“亲涉范畴”主要受人称敏感性和谓语动词[±自主]特征的影响;随后,我们以藏语拉萨话为例^②,探讨“亲涉范畴”在四种不同语境中所凸显出的非规约传信义,即[+参与]、[+意愿]和[+惯常];最后,我们发现,语言中“亲涉范畴”的存在与否会影响这三种非规约义的表达方式,非规约义和信源类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二 “亲涉性”的各种类型和影响因素

“亲涉性”一般认为属于广义的传信范畴(evidentiality)^③。“传信范畴”的核心意义在

* 本文初稿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系列讲座宣读(2022年2月16日),感谢交大师生的热情邀请。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谢忱。文中若有错讹,概由笔者负责。

^① “egophoricity”一词被译为“亲涉性”(吴越2020)、“自我中心范畴”(江荻2005;邵明园2014)、“向自我”(邵明园2016)等。本文选用“亲涉性”这一术语。

^② 绝大多数藏语都有“亲涉范畴”或类似于“亲涉范畴”的特征,只是在语境要求上略有不同。

^③ “evidentiality”在国内文献中有不同翻译,可参见樊青杰(2008:13-14)。本文选用“传信范畴”。

于表达信息来源。言者是信息的主要来源，主要分为“非自我”和“自我”两类。

“非自我”来源基于直接或间接证据。基于直接证据的主要是“五感”和内部感知（endopathic/inner sensations）；基于间接证据的主要是“推测（inference）”和“猜想（assumption）”。“自我”来源则基于元证据，即来自言者的“自知（self awareness）”和“亲身参与（participation）”，主要有“亲涉范畴”。

虽然“亲涉范畴”强调言者对其言语行为所述内容的参与程度，主要功能并非标记信息来源，但由于亲涉性在世界语言范围内的范畴化程度较低，因此大多被看作传信范畴的次类。

“信息来源”和“获取途径”是考察传信范畴的主要维度，也是影响亲涉范畴的两大因素。“信息来源”，即“谁的知晓”，引发亲涉范畴的人称敏感性，使其因句型变化（主语人称不同）而用法不同；“获取途径”，即“哪种亲涉”，是指谓词类型及其相关论元角色也会影响亲涉范畴的使用。以下我们以藏语拉萨话为例，对这两种维度分别进行讨论。

（一）谁的知晓——“亲涉性”的人称敏感性

亲涉标记主要搭配陈述句中的第一人称主语和疑问句中的第二人称主语，凸显的是言者（即认知主体）视角，因此具有人称敏感性。此外，在语义或语用因素的影响下，亲涉标记还能出现在其他非典型语境中，如搭配作领属语的第一人称（陈述句）和第二人称（疑问句）。

只能出现在典型语境中的“亲涉性”被称为“强亲涉性（strong EGO）”；能出现在非典型语境中的则被称为“弱亲涉性（weak EGO）”，此种情况下，亲涉范畴可以编码其他人称的主语，包括陈述句中的非第一人称和疑问句中的第三人称，或非主语位置上的第一、第二人称^①。藏语拉萨话兼有“强亲涉性”标记（即 -gi-yin 和 -pa-yin）和“弱亲涉性”标记（即 yin、yod、-gi-yod 和 -byung）。

（二）哪种亲涉——“亲涉”行为的类别

有些语言（如藏缅语中的加洛语 Galo）中的“亲涉范畴”只受句法成分的影响，但在另一些语言中（如藏语拉萨话），“亲涉范畴”受句法成分和语义角色的共同制约，即典型语境中的第一、第二人称主语必须是施事，而在非典型语境中，其他非核心论元也可以搭配“弱亲涉性”标记，例如表示“领属”义的论元，但此种情形下的“亲涉性”标记是可有可无的。

“亲涉性”信息的获取路径有“自主”和“非自主”两类，主要体现在谓词上。从某种程度上说，谓词的[±自主]特征决定了言者的论元角色。一般说来，所有动词在语义上都有[+自主]或[-自主]特征。自主动词通常指有意识的动作行为，发出者可以对该动作行为自由支配或主观决定；非自主动词则表示无意识的动作行为，发出者没有能动性。表变化、属性的动词和形容词也具有非自主特征。“亲涉性”的获取路径通常是[+自主]的（详见下文）。

三 “亲涉范畴”的编码意义和语境意义

本文选取前人研究较为深入、语料相对丰富的藏语拉萨话，利用“信息来源”的人称敏感性和“获取路径”的[±自主]特征，将亲涉标记出现的语境分为四类，说明它在这些语境中凸显出来的非规约意义。前人对藏语拉萨话亲涉范畴的描写大多在传信系统的框架内，并

^① 强、弱“亲涉性”也有很多其他术语，如“窄域（narrow scope）”和“宽域（wide scope）”（Tournadre 2008；Garrett 2001）、“人称限制类（‘person-restricted’ type）”和“观点类（‘point-of-view’ type）”（Satoko 2007）等。

结合了时、体等语法范畴，大体如下：

表 1 藏语拉萨话的“亲涉性”标记（Garrett 2001:162）^①

语法成分或语法范畴	亲涉性 EGO	直接信源 DIR	间接信源 IND
系词 COP	yin	—	red
存现、方所、领属或修饰 ELPA	yod	'dug	yod.red
未完成体 IMP	-gi-yod	-gi-'dug	-gi-yod.red
将来时 FUT	-gi-yin	—	-gi-red
过去时 PST	-pa-yin, -byung ^②	-song	-pa-red

（一）“信息来源”和[±施事自称]特征

“亲涉范畴”凸显的是言者视角，即第一人称主语（陈述句）和第二人称主语（疑问句），涉及[+施事]和[+自称]两种因素，若将二者结合，“亲涉性”标记可出现在三种语境中：

① 陈述句中的第一人称主语或疑问句中的第二人称主语，构成“强亲涉性”。例如^③：

（1）kha.sa nga khong-gi-nang-la phyin-pa-yin. 昨天我去他家。

昨天 1SG 3SG-GEN-房子-LOC 去-EGO.PST （Garrett 2001:163）

藏语拉萨话有两个“强亲涉性”标记：-gi-yin（EGO.FUT）和-pa-yin（EGO.PST）。

② 陈述句中的第一人称或疑问句中的第二人称作领属者、接受者、目标时，构成“弱亲涉性”。处于非主语位置上的“我”大多是领属者、接受者和目标。例如：

（2）nga'i bu skam.po yod. 我的儿子瘦。

1SG.GEN 儿子 瘦 EGO.ELPA （Garrett 2001:107）

③ 陈述句中的非第一人称主语或疑问句中的非第二人称主语也构成“弱亲涉性”。事件中的某一成分必须关涉到“我”，即“我”涉身其中。例如：

（3）khōng ngā: nang-la phēp-gi-yod. 他常来我这儿。

3SG 1SG.GEN 房子-OBL 来（敬语）-EGO.IMP （Tournadre 1996:223）

（二）“获取路径”和[±自主]特征

“亲涉性”信息的获取路径通常是[+自主]（判断句除外），但一部分“亲涉性”信息也可以通过[-自主]路径获得。这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所搭配的[-自主]谓词是表示变化、属性的动词或形容词，如例（4）（5）；二是个别“亲涉性”标记^④（即-byung）虽然用于言者

^① 本文语法缩写形式采用类型学通用的莱比锡标注符号：1SG=first 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单数；3SG=third 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单数；COP=copular 系词；DAT=dative 与格；DIR=directive 直接信源；EGO=egophoricity 亲涉性；ELPA=existence、location、possession、attributive 存现、方所、领属和修饰；F=feminine 阴性；FUT=future 将来时；GEN=genitive 属格；IMP=imperfective 非完整体；IND=indirective 间接信源；LOC=location 方位格；NOM=nominalization 名物化；OBL=oblique 旁格；PST=past 过去时；REC=receptive 接受的；SBJ=subject 主语。-gi-yin、-pa-yin、-gi-'dug 等看作一个标记。

^② 原文中，Garrett（2001）将 byung 单独列出。本文考虑到-byung 与-pa-yin 都是只用于过去时的亲涉标记，且二者所搭配的论元角色和动词性质少有重合，即便放在一组，也不会造成理解混乱，因此将它们放在一起。

^③ 本文用例均为已刊布语料，引证时随文标明出处。例句转写遵从原文，汉语对译和译文为作者翻译。

^④ 这类也被称为“接受亲涉性（receptive ego）”（Tournadre 2008；Tournadre & Dorje 2003），“目的导向亲涉性（goal-oriented ego）”（Garrett 2001），或“受事/经历类（undergoer-type）亲涉范畴”（San Roque et al. 2018）。

亲历某一事件，却只表示言者是该事件的接受者或目的对象等。也就是说，言者虽涉身其中，却没有自主行为，也就不需要搭配自主动词，如例（6）。

- (4) nga-r dngul tog.tsam yod. 我（通常）有一些钱。
1SG-DAT 钱 一些 EGO.ELPA (DeLancey 2018:782)
- (5) nga skyid.po yod. 我（通常）很开心。
1SG 开心 EGO.ELPA (Garrett 2001:73)
- (6) khos nga-la kha-par btang-byung. 他给我打电话。
3SG 1SG-DAT 电话 打-EGO.REC (Tournadre & Dorje 2003:147)

（三）藏语拉萨话“亲涉性”标记在四种语境中的分布

如果将[±施事自称]和[±自主]这两项特征进行排列组合，藏语拉萨话“亲涉性”标记和“直接信源”标记的使用范围分布如下^①：

表 2 藏语拉萨话“亲涉性”标记和“直接信源”标记的分布

传信标记	[+施事自称] [+自主]	[+施事自称] [-自主]	[-施事自称] [+自主]	[-施事自称] [-自主]
-gi-yin (EGO.FUT)	√	×	×	×
-pa-yin (EGO.PST)	√	×	×	×
yin (EGO.COP)	---	√	---	√
yod (EGO.ELPA)	---	√	---	√
-gi-yod (EGO.IMP)	√	√	√	√
-byung (REC.EGO)	---	√	√	√
-song (DIR.PST)	√	√	√	√
-’dug (DIR.ELPA)	---	√	√	√
-gi-’dug (DIR.IMP)	√	√	√	√

（注：√表示存在；×表示不存在；---表示根据语义不应该存在或少见）

表 2 表明，“强亲涉性”标记 -gi-yin 和 -pa-yin，只用于 [+施事自称，+自主] 句，“弱亲涉性”标记和“直接信源”标记在分布上大体类似。Garrett (2001:189) 认为，“‘弱亲涉性’在句法上都不是必须的，很多时候都能用‘直接/间接信源’代替”。Chang & Chang (1984) 则认为，如果言者是第一人称主语，那么句中是否用“亲涉范畴”并不取决于句法环境，而取决于言者的主观或情感距离，类似于英语中用“this”和“that”表示亲疏关系。

本文不同意 Chang & Chang (1984) 的观点，我们发现“亲涉范畴”至少涉及三类特征：[±意愿]、[±惯常]和[±参与]。[+意愿]表示“有意识的、符合言者意愿、可控的”，与“无意识的、违反言者意愿、不可控的”相对；[+惯常]表示“长期的、一般性的”状态，与“暂时的、特殊性的”状态对立；[+参与]表示与“我”相关的人或物，或者“我”是事件结果或趋向的终点。

^① 表 2 只展示了“亲涉性”和“直接信源”标记的使用范围，这是因为二者的“信息来源”都是“言者”，可比性强。在下文例句中，我们还列举了个别具有“间接信源”标记的句子。

四 藏语拉萨话“亲涉范畴”在四类语境下所凸显的语用功能

Gawne (2017) 汇总了各地区藏语^①中“亲涉范畴”的主要语用表现,展示了其语用功能的多样性^②,但没有涉及这些功能出现的语义和句法环境,也未对藏语拉萨话进行深入探究。下面我们将讨论藏语拉萨话中“亲涉范畴”的各种语用功能及其语境条件。

(一) [+施事自称, +自主] 语境

该语境是“亲涉范畴”的典型语境(表 EGO.REC 的 -byung 除外),其他传信类型在该语境中都不太常见。言者作为有意识的施动者,其动作行为是导致某种结果或状态的最终源头。亲涉标记的使用让句子侧重言者的能动性,强调该动作行为出于言者意愿,如例(7a)(8a);而“直接信源”和“间接信源”侧重信息来源,并不在意言者意愿是否实现,如例(7b)(7c)(8b)。

- (7) a. nga-s dkar.yol bcag-pa-yin. 我故意打破了杯子。[+意愿]
 1SG-SBJ 杯子 打破-EGO.PST (Denwood 1999:143)
 b. nga-s dkar.yol bcag-song. 我无意中打破了杯子。[-意愿]
 1SG-SBJ 杯子 打破-DIR.PST (DeLancey 1990)
 c. nga lha.sa-r phyin-pa-red. 我(在很久以前被带着)去了拉萨。[-意愿]
 1SG 拉萨-LOC 去-IND.PST (Chang & Chang 1984:7)
 (8) a. nga-s byed-gi-yin. 我情愿做这件事。[+意愿]
 1SG-SBJ 做-EGO.FUT (Denwood 1999:135)
 b. nga-s byed-gi-red. 我得做这件事(我没有选择)。[-意愿]
 1SG-SBJ 做-IND.FUT (Denwood 1999:135)

Curnow (2003) 认为,用“传信范畴”表达 [+意愿] 只存在于已经发生的事件中,且句中主语必须是第一人称。但我们在拉萨话中发现了如例(8)这样的用于将来事件的例子。

[+意愿] 和“亲涉性”在概念上相关,因为 [+意愿] 是言者亲历的动作行为的一部分。DeLancey (1990) 认为,典型的自主行为包括一系列事件,主要有实施该行为的意愿、行为本身和行为结果。如果一种行为是 [+意愿] 的,那么言者就能“看到”这一系列事件的全过程;反之就“看不到”。也许正是由于“直接信源”不强调个人意愿,因此在相同语境下,用“直接信源”标记就比用“亲涉性”标记显得更加委婉和礼貌,如例(9)。

- (9) a. nga gcig dgos-gi-yod. 我要一个。
 1SG 一 要-EGO.IMP (Denwood 1999:177)
 b. nga gcig dgos -gi-'dug. 我要一个。(更礼貌)
 1SG 一 要-DIR.IMP (Denwood 1999:177)

有意思的是,有些动词兼具 [±自主] 两种特征(例如“咳嗽”),在搭配不同标记时,由

^① 包括藏语标准语(standard Tibetan)/藏语拉萨话(Lahsa Tibetan)、杂居通用藏语(Diasporic Common Tibetan)/卓巴藏语(Drokpa)、吉隆藏语(Kyirong)、约尔莫语(Yolmo)、锡金藏语(Denjongke)、勺洛藏语(Zhollam)、宗喀语(Dzongkha)、安多藏语(Amdo Tibetan)。

^② Gawne (2017) 所提及的“亲涉范畴”的语用表现及其语言(方言)有: [+意愿](杂居通用藏语/卓巴藏语、藏语拉萨话); [+参与](宗喀语); [+惯常](吉隆藏语、约尔莫语)和 [+意外](宗喀语)。

于各标记所凸显的语义不同,使得该动词自行区分了[±自主]特征,如例(10)。

(10) a. glo rgyab-pa-yin.

咳嗽-EGO.REC

我故意咳嗽。

(Denwood 1999:139)

b. glo rgyab-byung.

咳嗽-EGO.REC

我无意中咳嗽。

(Denwood 1999:139)

例(10a)中,“咳嗽”搭配“施事类”亲涉标记^①-pa-yin。作为强亲涉标记,-pa-yin只用于[+施事自称]语境,且凸显[+意愿]义,因此例(10a)的句义是“我故意咳嗽”;但在例(10b)中,“咳嗽”搭配“受事/历事类”亲涉标记-byung,这类标记只表示言者涉身其中,是行为动作的接受者,因此例(10b)的句义是“我无意中咳嗽”。

(二)[+施事自称,-自主]语境

该语境中的谓词不具有自主性,言者只是事件的参与者。亲涉标记的使用让句义有了[+惯常]特征,表示“长期的、一般性的、熟知的”状态,如例(11)(12a);与之相对的是由“直接信源”表达的[-惯常]特征,表示“暂时的、突发的、新知的”状态,如例(11)(12b)。

(11) nga skyid.po yod yin-na'i de.ring nga skyid.po mi-'dug.

1SG 开心 EGO.ELPA 但 今天 1SG 开心 NEG-DIR.ELPA

我通常很开心,但我今天不开心。(Garrett 2001:73)[+惯常]和[-惯常]

(12) a. nga na-gi-yod.

1SG 病-EGO.IMP

我长期生病。[+惯常]

(Denwood 1999:138)

b. nga na-gi-'dug.

1SG 病-DIR.IMP

我现在生病了。[-惯常]

(Denwood 1999:138)

与其他亲涉标记不同,-byung 更强调动作行为的趋向或事件的结果与言者之间的关系。DeLancey(1990)把这种关系看作以言者为动作行为或事件的“终点/归宿”,如例(13a)。与-byung 对应的是-song, -song 把言者作为动作行为或事件的“原点”,如例(13b)。而且,与-byung 搭配的谓词“记得”在言者的掌控范围内,是自主的,具有[+意愿];而与-song 搭配的“忘记”是言者无法控制的、非自主的行为,具有[-意愿]。另外,-byung 还凸显了[+惯常],如例(14a)。

(13) a. nga-s kho'i ming dren bsos-byung.

1SG-ERG 3SG.GEN 名字 记住-EGO.REC

我记得他的名字。[+意愿]

(DeLancey 1990)

b. nga-s kho'i ming brjed-song.

1SG-ERG 3SG.GEN 名字 忘记-DIR.PST

我忘了他的名字。[-意愿]

(DeLancey 1990)

(14) a. 'di nga-s ha go-byung.

那 1SG-SBJ 知道-EGO.REC

我已经知道。[+惯常]

(Denwood 1999:44)

b. 'di nga-s ha go-song.

那 1SG-SBJ 知道-DIR.PST

我刚刚知道。[-惯常]

(Denwood 1999:44)

(三)[-施事自称,+自主]语境

该语境只有-gi-yod 和-byung 这两个亲涉标记较为常见,均凸显[+参与]。例句如下:

^① Bickel(2000)、Widmer(2015)、San Roque et al.(2018)将“亲涉性”标记分为两类:“主语/施事类(subject/actor-type)”和“受事/历事类(undergoer-type)”。

- (15) a. khong-gis gnang-byung. 他把它给（我）了。[+参与]
3SG-SBJ 给-EGO.REC (Denwood 1999:143)
b. khong-gis gnang-song. 他把它给（你或其他人）了。[-参与]
3SG-SBJ 给-DIR.PST (Denwood 1999:143)
- (16) a. khong-gis nga-la gzhas bslab gnang-gi-yod. 她教我歌。[+参与]
3SG-SBJ 1SG-LOC 歌曲 教 做-EGO.IMP (Denwood 1999:137)
b. khong-gis gzhas bslab gnang-gi-'dug. 她教歌。[-参与]
3SG-SBJ 歌曲 教 做-DIR.IMP (Denwood 1999:136)

(四) [-施事自称, -自主] 语境

该语境中, 亲涉标记既凸显 [+参与] (如例 17a、18a), 又凸显 [+惯常] (如例 18b); 此时, “直接信源”还可表达“意外”义 (如例 18c、19b)。

- (17) a. nga-'i nang-la shmi yod. (DeLancey 2001)
1SG-GEN 家-LOC 猫 EGO.ELPA
有只猫在我家里。(我的猫) [+参与]
b. nga-'i nang-la shmi 'dug. (DeLancey 2001)
1SG-GEN 家-LOC 猫 DIR.ELPA
有只猫在我家里。(别人的猫) [-参与]
- (18) a. ja 'di zhim-po yin. (我亲自挑选的) 这茶好喝。[+参与]
茶 这 好喝-NOM EGO.COP (Denwood 1999:124)
b. ja 'di zhim-po yod. (我通常认为) 这茶好喝。[+惯常]
茶 这 好喝-NOM EGO.ELPA (Denwood 1999:124)
c. ja 'di zhim-po 'dug. (我发现) 这茶好喝! [+意外]
茶 这 好喝-NOM DIR.ELPA (Denwood 1999:124)
d. ja 'di zhim-po yog.red. (Denwood 1999:124)
茶 这 好喝-NOM IND.ELPA
(据说) 这茶好喝/这茶 (应该) 好喝。[+推断]
- (19) nga-r dngul tog.tsam 'dug.^① (出乎意料地发现) 我有钱! [+意外]
1SG-DAT 钱 一些 DIR.ELPA (DeLancey 2018:781)

Aikhenvald (2004:207) 认为, 有些传信类型可以兼表“意外”, 特别是“非亲历”“推断”和“引述”。而例 (18c) 和例 (19) 中的“意外”义却由“直接信源”表示, 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意外”必定产生于言者的意愿之外, 在具有亲涉标记的语言中, “直接信源”在一定语境下可以凸显 [-意愿], 因此能被用来表达“意外”义。上述四种情况总结如下:

表 3 四种语境中“亲涉范畴”所凸显的语用义

四种语境		“亲涉范畴”所凸显的语用功能
信息来源	信息路径	
[+施事自称]	[+自主]	[+意愿]
[+施事自称]	[-自主]	[+惯常]

^① 与例 (19) 形成对比的是前文例 (4)。

[-施事自称]	[+自主]	[+参与]
[-施事自称]	[-自主]	[+参与] 和 [+惯常]

五 无“亲涉范畴”的语言对 [±意愿]、[±惯常] 和 [±参与] 的表达

如上所述，在具有“亲涉范畴”的语言中，“亲涉性”标记在四种语境中凸显了三类语用功能：[+意愿]、[+惯常] 和 [+参与]，与之相对的 [-意愿]、[-惯常] 和 [-参与] 主要由“亲见/直接信源”表达——这一分配格局在缺乏“亲涉性”标记的语言中则完全不同。

(一) [±意愿]

在缺乏“亲涉性”标记的语言中，[+意愿] 由“一手信息”（A1 类^①传信系统）或“亲见/直接信源”（B1 类、C1 类或 D1 类传信系统）与第一人称主语搭配时产生；[-意愿] 则由“非一手信息”（A1/2 类）、“报道”（A3 类）或“非亲见/间接信源”（B1 类、C1 类或 D1 类）与第一人称主语搭配表达，如贾拉瓦拉语（Jarawara）^②。

(二) [±参与]

在缺乏“亲涉性”标记的语言中，[+参与] 由“一手信息”（A1/2 类）和“亲见/直接信源”（B1 类、C1/2/3 类和 D1 类）搭配第一人称主语表达；[-参与] 则由相应的“非一手信息”和“非亲见/间接信源”表达（Aikhenvald 2004:67），如卡拉什语（Kalasha）^③。

(三) [±惯常]

[+惯常] 所表达的主要是“常识（general knowledge）”。“常识”主要有三类（Kittilä 2019）：科学事实（如“2+2=4”）、状态事件（如“张三是个语言学家”）和反复发生的习惯性事件（如“张三每天去公园跑步”）。另外，[+惯常] 还可以表达“旧知”。

在缺乏“亲涉性”标记的语言中，[+惯常] 可由专门的“常识信源”表达；也可由“一手信息”或“亲见/直接信源”表达。不过，[+惯常] 中“反复发生的习惯性事件”这部分意义却很少由传信标记表达，而多由“重复体（habitual/iterative aspect）表达”^④。

[-惯常] 表达的主要是“新知”，既然是新获取的知识，必定超出了言者的知识域，是“刚刚发生或发现的”（如例 12b），或“让言者感到意外的”（如例 19）。

可见，“亲涉范畴”的存在与否，使语言的传信类型在表达 [±意愿]、[±惯常] 和 [±参与]

^① Aikhenvald (2004:65) 基于“亲见”等六个语义参项，提出了类型学上的传信分类法，主要有 A/B/C/D 四类传信模式，下又分为 13 小类。

^② 贾拉瓦拉语 A1 类的“亲见”和“非亲见”信源在与第一人称主语搭配时，分别凸显了[+意愿] 和 [-意愿]，例如（Aikhenvald 2004:326）：

a. Jama soki jaa maki bojo o-na-hare-ka. 晚上（我醒着的时候）摸到了一个男人。
事情（F） 黑 在 男人 碰/摸 1sgA-AUX-IMM.P.FIRSTH.m-DECL.m
b. Jama soki jaa maki bojo o-ne-hino-ka. 晚上（我睡着的时候）摸到了一个男人。
事情（F） 黑 在 男人 碰/摸 1sgA-AUX-IMM.P.NONFIRSTH.m-DECL.m

^③ 卡拉什语 A2 类的传信类型分为“一手信息”和“非一手信息”，它们在与第一人称主语搭配时，分别凸显了 [+参与] 和 [-参与]（Aikhenvald 2004:155）：

a ayà a àgar' Zot kàda
我 这儿 来.PST.FIRTH 火 已经 做.PST.NONFIRSTH.3
我来这儿（个人所见，亲身经历，即 [+参与]），（有人）已经生了火（“我”未在场，没见到生火过程，即 [-参与]）。

^④ 该观点来自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这三种语用功能时，出现了错位情况，总结如下：

表 4 三种语用功能在有/无“亲涉范畴”的语言中所对应的传信类型^①

语用功能	有“亲涉范畴”的语言	无“亲涉范畴”的语言
[+意愿]	“亲涉性”标记	“一手信息”或“亲见/直接信源”
[+参与]	“亲涉性”标记	“一手信息”或“亲见/直接信源”
[+惯常]	“亲涉性”标记	“常识信源”
		“一手信息”或“亲见/直接信源”
[-意愿]、[-参与]和[-惯常]	“一手信息”或“亲见/直接信源”	“非一手信息”或“非亲见/间接信源”

六 结 语

很多藏语方言中的“亲涉性”标记在不同语境下会凸显不同的语用引申义。本文以藏语拉萨话为例，以“信息来源”和“获取路径”为参项，将“亲涉性”标记所分布的语境分为四类，深入探讨了四类语境与[+意愿]、[+惯常]和[+参与]等引申义间的对应关系。

我们还发现，这些语用引申义会因语言是否具备“亲涉范畴”而采用不同的“信源”表达，产生了“逐级错位”现象。可见，“信源”和引申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何种信源能产生何种语用功能，是由整个传信系统的格局决定的。希望本文不仅能加深对“亲涉范畴”的功能和地位的认识，也能为未来“亲涉范畴”的类型研究提供一个可以参考的框架。

参考文献

樊青杰. 2008. 《现代汉语传信范畴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江 获. 2005. 《藏语拉萨话的体貌、示证和自我中心范畴》，《语言科学》第 1 期。
邵明园. 2014. 《安多藏语阿柔话的示证范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邵明园. 2016. 《中古藏语的系动词》，《民族语文》第 2 期。
吴 越. 2020. 《〈亲涉性〉述评》，《当代语言学》第 3 期。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ickel, Balthasar. 2000. On the syntax of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Studies in Language* 24(3): 583-609.
Chang, Kun and Betty Shefts Chang. 1984. The certainty hierarchy among Spoken Tibetan verbs of being.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55(4): 603-635.
Curnow, T Jowan. 2003. Nonvolitionality expressed through evidentials. *Studies in Language* 27(1): 39-59.
DeLancey, Scott. 1990. Ergativity and the cognitive model of event structure in Lhasa Tibet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1(3): 289-321.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 369-382.
DeLancey, Scott. 2018. Evidentiality in Tibetic. In Alexandra Y. Aikhenvald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pp. 768-78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nwood, Philip. 1999. *Tibetan*.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① 以[+惯常]为例，该表格意为：在有“亲涉范畴”的语言中，“亲涉性”标记可表示[+惯常]，并不是说该语言中的[+惯常]完全由“亲涉性”标记表达。

- Garrett, Edward John. 2001. *Evidentiality and Assertion in Tibet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PhD dissertation.
- Gawne, Lauren. 2017. Egophoric evidentiality in Bodish languages. In Lauren Gawne and Nathan W. Hill (eds.), *Evidential Systems of Tibetan Languages*, pp. 61-94. Berlin/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Kittilä, Seppo. 2019. General knowledge as an evidential category. *Linguistics* 57(6): 1271-1304.
- San Roque, Lila, Simeon Floyd and Elisabeth Norcliffe. 2018. Egophoricity: An introduction. In Simeon Floyd, Elisabeth Norcliffe and Lila San Roque (eds.), *Egophoricity*, pp. 1-77.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Satoko, Shirai. 2007. Evidentials and evidential-like categories in Ndrapa.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0(2): 125-150.
- Tournadre, Nicolas. 1996. *Comparaison des systèmes médiatifs de quatre dialectes Tibétains: Tibétain Central, Ladakhi, Dzongkha et Amdo*. Louvain: Peeters.
- Tournadre, Nicolas and Dorje Sangda. 2003. *Manual of Standard Tibetan: Language and Civilisation*. Ithaca: Snowlion Publications.
- Widmer, Manuel. 2015. The transformation of verb agreement into epistemic marking. In Jürg Fleischer, Elisabeth Rieken and Paul Widmer (eds.), *Agreement from a Diachronic Perspective*, pp. 53-73. Berlin/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The Prominence and Dislocation of Non-normative Evidential Meanings in Languages with Egophoricity

ZHANG Ling

[Abstract] Based on personal sensitivity of egophoricity and the [$\pm$ volition] attribute of the main predicate in the sentenc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contexts of egophoricity into four types, and believes that egophoricity will highlight various pragmatic meanings in different contexts. Although these extended meanings are common in the evidential system and have typological generality,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meanings in languages with egophoric markers is different, resulting in the phenomenon of “cascade dislocation”.

[Keywords] egophoricity evidential function Lhasa Tibetan

(通信地址: 310023 杭州 浙江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